

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

鮑志成

[摘要] 晚清民國時期杭州作為開埠口岸和東南茶區茶葉外銷集散中心，茶葉貿易繁盛，不僅內銷，還外銷至歐美等國，更有外國茶園（茶館）開設。位於錢塘江流域，發達的航運系統使杭州成為了皖贛茶葉經錢江水道出口外銷的必經之路。杭州茶葉的出口外銷促進了茶葉種植和加工業的發展，以及與茶葉交易有關的服務業如過塘行、轉運業、堆疊業、挑埠業、報關業、保險業等的興起。杭州茶葉外銷明顯受國內外形勢影響，其發展軌跡是近代化轉型期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 晚清民國 杭州 茶葉外銷 集散中心 轉運服務業

新航路開闢以後，通過對外貿易，“中國茶”進入歐美上層社會。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五口通商，開展了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的序幕，茶葉與瓷器、絲綢作為大宗出口商品，經由開埠口岸大量出口，東南地區的茶業因出口拉動而呈迅猛發展之勢。在外銷出口需求的刺激之下，杭州的茶葉生產也開始了近代化步伐。筆者擬就近代杭州茶葉的外銷出口、租界洋行、貨源集散、轉運服務等情況作出分析。

一、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生產和外銷貨值

鴉片戰爭後，杭州所產茶葉通過寧波、上海出口。杭州開埠後，本地出產的茶葉經由杭州海關出口，而皖贛茶葉亦轉運來杭出口，這使杭州成為茶葉集散地，茶葉作為大宗出口產品，位列各類出口商品之首。抗戰爆發後，茶葉外銷銳減，茶業經濟遭到重創腰斬。總體而言，近代杭州茶業建立在外需基礎之上，受時局影響甚大，呈現起伏曲折、興衰變遷的發展歷程。

清末道光至光緒年間，杭州茶業劃分為遂淳、杭州兩大茶區。遂淳茶區主產梅茶，主要外銷；杭州茶區則以產製龍井、旗槍、烘青聞名，主要內銷。當時淳安的威坪鎮是遂（安）、淳（安）、開（化）、歙（縣）四縣的茶葉集散地，製茶工人有數千之多，年產茶一萬多箱，外銷統稱“遂綠”。杭州茶區除龍井、旗槍外，還生產花茶。1884年引入茉莉、白蘭花。臨安、昌

作者簡介：鮑志成，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文化傳承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杭州 310007

化、於潛、建德、桐廬、分水所產高檔烘青“毛峰”，為窰製高級茉莉花茶的上品“茶坯”，淳安、昌化所產的大方茶，窰製後的“茉莉大方”為花茶上品，暢銷我國北方各地。杭州市郊周浦一帶夏茶還產製紅茶，後來嫩採細做，創製出了“九曲紅梅”，成為杭州紅茶名品。此外，富陽、桐廬、建德等地也一度產製紅茶。紅茶生產的興起，乃是為了滿足出口外銷的需求。杭州出產的“遂綠”、毛峰和紅茶通過寧波、上海輾轉出口。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杭州為通商口岸。杭州武林門外拱宸橋北運河東岸一帶，自長公橋起至拱宸橋止成為外國商民的居住地，實際上就是通商場界址。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897年5月13日），日本又獲得了對整個通商場的“專界專管”權，界內所用馬路、橋樑、溝渠、碼頭以及巡捕，均由日本領事官管理、修造，與中國地方官無關，通商場事實上淪為日租界。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896年9月26日），杭州海關開關；同年10月1日，正式開始徵稅。杭州開埠、設立洋關後，茶葉被列為杭州關大宗出口商品之首，杭州本地所產茶葉和經由錢江水道轉運來杭出口的皖贛茶葉逐年增加。根據杭州海關報告，杭州海關開埠當年，在杭州關開關第一年的三個月中共出口茶葉41擔，全是西湖龍井茶。^①1897年，安徽、紹興等地的一些茶商，為了降低運輸成本，減少途中損毀，把原來從寧波關出口的茶葉，改為從杭州關出口，其品種主要有徽州（Fychow）茶葉和紹興平水茶。1897年，杭州海關茶葉出口量為75,347擔，1898、1899及1900年分別為86,984、86,452、80,849擔。1901年，再提升至90,071擔，其中以徽州茶為大宗，達75,327擔。這些茶葉除小部分運往北方省份外，大部分輸往美國和俄國。尤其是龍井，雖然出口規模較小，但很興旺，並獲得行家“超級的評價”，飲譽海外。外貿需求的不斷增長，刺激了茶葉種植業。在其後的十年中，杭州附近種茶面積“有巨大的擴展”。與此同時，杭州拱宸橋開關通商場後，外國洋行、茶園（茶館）紛紛開設起來，其中不少由日本商人開設，如大馬路洋橋邊的陽春茶園、二馬路中央的天仙茶園、里馬路的榮華茶園，抗戰時期在杭州西湖菩提精舍內的協和茶行等。

開埠後的杭州，成為徽茶、贛茶轉運出口的集散地，從新安江上游徽州歙縣到杭州南星橋碼頭的錢江水道，成為茶葉運輸的黃金水路。與茶葉交易有關的服務業如茶行、茶場、船運、堆疊、過塘、茶箱、報關、保險等興起，杭州茶號林立，茶館密佈，交易興隆，呈現近代茶都氣象。

民國前期，茶葉作為杭州主要外銷產品，產銷兩旺，數額逐年增加。1912—1916年，美國、法國的茶葉進口減少，1917年俄國發生革命，茶葉進口陷於停頓，從而影響了出口量。但在整個近代杭州對外貿易中，茶葉始終是大宗的出口商品，並佔據着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1922—1931年，年平均出口茶葉7,520噸，貨值6,117,260兩。據統計，從開埠後到1937年，經杭州關出口的茶葉累計多達256,694噸。^②外銷的持續看好，促進了茶葉種植和加工業的發展。據

① 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杭州，1896—1901）》，陳梅龍、景消波譯編：《近代浙江對外貿易及社會變遷——寧波、溫州、杭州海關貿易報告譯編》，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年。

② 根據以下等書累計：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杭州，1896—1901）》，陳梅龍、景消波譯編：《近代浙江對外貿易及社會變遷——寧波、溫州、杭州海關貿易報告譯編》，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年；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所，1982年。

《中國實業志》記載，1932年杭州市茶園面積22.4萬畝，1930—1936年年均產茶5,000餘噸。市郊龍井茶園2,000畝，每年產茶約28噸，主銷市內和滬上居民。據《杭州史地叢書》杭州市商業統計資料，^①1931年杭州市區製茶廠、作坊有77家，職員741人，茶館555家，職員1,273人。

抗戰爆發後，杭州茶葉出口遂告停止，杭州茶葉生產一落千丈。“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相繼侵佔東北、華北，杭產龍井、毛峰、香片等茶失去東北、華北市場。出口市場也遭遇日本、印度等競爭，內外銷急劇下降。1937年冬杭州淪陷，茶農顛沛流離，背井離鄉，茶山荒蕪，茶園荒棄，加上茶葉價格低賤，一些茶農不得不挖茶種糧，勉強維持生計，茶葉生產遭到破壞性損害。至1949年，全市茶園面積僅117,100畝，產茶2,988噸，出口茶葉1,500噸，茶葉產銷跌入低谷。^②

作為晚清杭州外銷茶大宗的“鳩坑茶”，銷往外洋統稱“遂綠”，與徽茶“屯綠”相似。產品花色有珍眉、鳳眉、娥眉、秀眉、熙春、松蘿、三角等，加工的遂綠珍眉分別由產地轉運上海口岸出口。當時，外銷茶以銷往美國和加拿大為主。一部分銷往近東及小亞細亞，銷往法、英等國的珍眉茶多數轉銷西北非市場。1933—1939年，吳覺農因戰事干擾，在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組織中茶公司、浙江茶葉辦事處、合作管理局、中國銀行等部門，以“東南茶場（廠）聯合會”名義，到淳安、遂安兩縣積極組建茶葉合作社，實行聯合製茶，產品由國家統購銷售，有效地排除了中間商的盤剝，穩定了茶葉產銷局勢，促進了茶葉發展，鳩坑茶產銷進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鳩坑茶貿易的主營單位是淳安、遂安兩縣的合作社。1933年6月，省建設廳為淳、遂兩縣並分別派駐合作事業指導員，催生了兩縣的合作社。至1936年，兩縣先後建立各種合作社12個，1939年發展到38個，其中茶葉合作社12個，1948年又擴大到417個。這些合作社的建立，對採購、遠銷、促進鳩坑茶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茶葉合作社把指導生產、收購茶葉、包裝遠銷等作為中心任務。茶葉收購，由茶農送貨上門，看茶定價，雙方逢合，即過秤付款，現鈔兌現。收購後的茶葉，有的轉入城鎮或威坪茶葉集散地，有的經包裝成箱、篾後，直運滬、杭、金華、衢州等地轉銷。在兩縣內的賀城、獅城、茶園鎮、港口鎮、威坪鎮等城鎮中，大部分食品、副食品商店均兼營散裝茶葉，同時還設有多家專營茶葉店、茶館等。1939年，淳安縣合作社聯合上海、杭州等茶行、官僚，在威坪、橋西、航頭等集鎮，設12個廠號，集資收購毛茶。加工後，外銷茶運往上海；內銷烘青、大方，經烘焙、揀剔，包裝成篾後運銷蘇、杭，或運往福建窰花再轉售天津、營口一帶。同年，遂安縣也輸出遂炒1.5萬箱。1941年，中茶公司浙江分公司在淳、遂兩縣分別設立若干收茶處，收購本年度箱茶。

抗戰前，每擔珍眉茶約值120兩銀子。到了抗戰中後期，外銷困難，茶價也越壓越低，一擔茶葉只能換到兩擔鹽或一擔大麥，嚴重影響了茶葉生產的發展。1941—1949年，由於戰事頻繁，外銷疲滯，內銷官紳高利貸盤剝，奸商漁利私囊，茶價低賤傷農，產銷逐年衰落，淳、遂兩縣先後組建的417個合作社全部解體。鳩坑茶經營貿易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民間還流傳着“一擔茶葉換不到一擔鹽，茶農生活苦黃連，過年過節叫皇天”和“吃的樹草皮、住的茅草被，穿的八褂衣”的民謠。

^① 杭州市圖書館輯：《杭州史地叢書》，杭州：杭州圖書館，1985年。

^② 胡新光：《杭州茶葉發展史略》，《中國茶葉加工》（杭州）1997年第3期。

二、錢塘江水道的茶葉運輸和杭州茶葉外銷集散地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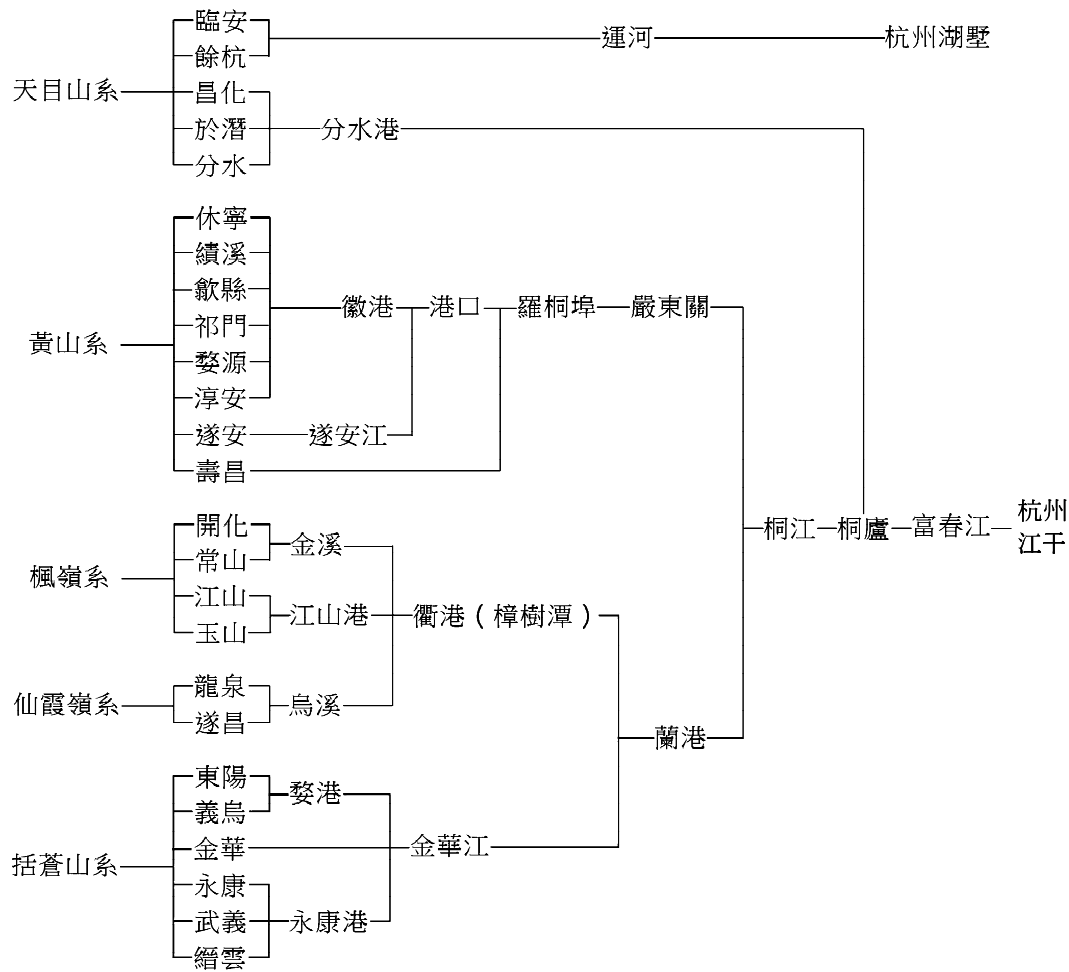
晚清民國時期，杭州是安徽、江西和浙江金華、蘭溪、浦陽各路茶葉的集散地，天下茶商雲集杭城，爭相“親往名山，採辦龍井貢茶”。浙東運河平水茶葉的茶船，也在江干閘口停泊，或經閘口進入龍山河水閘、鳳山水門，沿杭州中河，北出武林水門、拱宸橋沿江南運河，前往浙西、江蘇；或在閘口登陸，經滬杭鐵路至上海；或由陸路將杭、皖、贛茶銷向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或登海輪，銷往歐美、南洋。

安徽南部徽州下轄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婺源等縣，與浙江嚴州之淳安、遂安接壤。這裏崇山峻嶺，氣候極宜茶樹生長，每縣均出產名茶。民國時期婺源劃至江西，但傳統上婺源茶仍屬於徽茶。此外，安徽的安慶、寧國、池州、廣德、六安等地也產佳茶。徽茶大部分循錢江水道運到杭州，除部分在杭州銷售外，大多轉運到上海、江蘇行銷。徽商中的代表多半就是茶商，他們跑遍全國茶區，足跡遍佈大江南北，杭州許多大茶莊都是安徽茶商所開的，如方正大茶莊老闆方冠三、方舜琴，福茂茶行經理、杭州茶業公會理事長章特英，都是安徽人。江西地理氣候也宜茶，產茶僅次於浙江，清代江西南昌府的鶴嶺茶、南康府廬山茶、建昌府白茶都已為貢茶，其他如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袁州府、贛州府、寧都府、南安府均產名茶。數百年來，徽贛茶葉經錢江水道運往杭州，再轉運上海銷往全國各地，有的遠銷海外。

錢塘江橫貫浙江，全長 605 公里，流域面積 4.88 萬平方公里，是浙江的母親河，其源出安徽省休寧縣六股尖，安徽歙縣浦口以上稱率水、漸江，浦口以下至浙江省建德梅城間稱新安江；梅城至桐廬間稱桐江；桐廬至蕭山聞堰間稱富春江；聞堰至上城閘口段河道曲折如“之”字，故稱之江；閘口以下稱錢塘江。沿途匯入常山港（衢州以下稱衢江、蘭江）、桐溪、浦陽江等主要支流，到海鹽縣澉浦以下注入東海杭州灣。錢塘江水道自古以來就是商貿物資運輸的黃金水道，在近代的茶葉轉口貿易中，錢江水道更是皖贛茶葉轉運杭州出口外銷的必經之路。晚清《新增繪圖幼學瓊林》所刊“浙江全圖”，可直觀地看出這條水道的走向，從皖贛境內和錢塘江上游到杭州江干閘口的茶葉運輸路線，按所經流域依次分為：天目山系經分水港；黃山系經徽港、遂安江；仙霞嶺系經烏溪；楓嶺系經金溪、江山港；括蒼山系經婺港、金華江、永康港，最終匯集至建德梅城，經桐廬桐江、富陽富春江到杭州江干閘口，徽、贛、浙茶在此再經由龍山河越杭州城區運河到拱宸橋，經杭州海關轉口，由大運河運往上海出口。

根據當年航運路線和沿途停靠碼頭（港口）可繪製《錢塘江運茶路線圖》（圖 1），這條直達杭州的茶葉運輸水道，最遠的是皖南黃山系各縣和江西婺源縣，所出產茶葉自當地水道經新安江（徽港）運至桐江、富春江而至杭州江干，前後需時一月之久。其次是黃山餘脈入浙江後的丘陵地區如遂安縣（今屬淳安縣），集中於淳安縣的港口，由壽昌經羅桐埠，併入徽港經桐江、富春江而至杭州江干，需時約半個月。至於與嚴州府屬各地路程相仿的衢（州）屬、處（麗水）屬各縣產茶區，前者為仙霞嶺丘陵地，後者為楓嶺丘陵地，其北麓一部分由水口放木筏下運，經衢港至樟樹潭，順流而下，至杭州江干約各需時半日。此外，括蒼山系之金華府屬如金華、蘭溪、浦江、東陽等縣茶葉，經金華而下運；或天目山系杭屬各縣如於潛、昌化、分水、新登、桐廬、富陽等地之茶葉，經天目溪、分水港、富春江而下運，其自水口至杭州江干，約各需十天。因其地離杭雖較近，但上游水勢不暢，運輸較為困難。上述運輸所需時日，是平時水流暢通時的估計，如遇洪水暴發或河水旱涸時，則多半未能如期到達甚至停航。

圖1 錢塘江運茶路線圖



因杭州開口位於錢塘江下游，大運河南端，來自錢塘江上游安徽、江西之運輸來杭茶葉，根據產地和遠近不同，茶市坊間也各有別稱。如就衢港言，有常山、江山、開化、龍泉、雲和、縉雲、宣平、遂昌等縣所產茶葉；就徽港言，有皖南之休寧、歙縣、績溪，江西之婺源等地之茶葉；以及省內淳安、遂安、壽昌、建德各縣之茶葉，行市統稱之曰“上港茶”。而下游來自金華江、富春江一帶以及苕溪兩岸山林所產之茶，包括金華、東陽、永康、武義各縣之茶葉，以及分水港臨安、於潛、昌化、分水之茶葉，統稱為“下港茶”。

1907年7月15日，杭州江干至湖墅鐵路開通，浙杭有了第一條鐵路；1909年2月11日至6月28日，杭州至嘉興鐵路逐段開通；7月28日，滬杭鐵路通車。滬杭鐵路雖開通，錢塘江茶路的終點開口仍然是鐵路的交接點，杭州作為水陸交通樞紐和茶葉集散地的地位，仍未改變。

據1931年《杭州市經濟調查》，1930年經開口之皖南歙縣、休寧、績溪、黟縣，以及婺源，錢塘江上游之桐廬、建德、衢州、蘭溪、金華、浦江等所產茶，有由茶戶（又稱山客）自出產地運至杭州售於茶商者，有由茶商（又稱水客）直接至茶山採運至杭運銷他處者。1931年運抵杭州者達37萬擔，再由杭州運出者計34.402萬擔，總值1,437.47916萬元。其中主要是徽茶，約18萬擔，總值700餘萬元；次為贛東各縣之贛茶，約值182萬元；來自衢、嚴、金、處各縣之浙東茶約10萬擔，價值400萬元；另有臨安、餘杭、武康及杭縣之所謂“四鄉茶”，約

4萬擔，約值200萬元。入境的37萬餘擔茶葉，約3萬擔就地銷售於杭州各茶莊，出境34萬擔中有1.8萬擔再由各茶莊運至廣東、香港及山東、營口（遼寧）銷售。在杭州售於各茶莊運出者，為中等以上之茶，每斤價格0.3—1元。由候潮門外茶行轉運出境者，有裝箱、裝篋兩種，裝箱者係細茶，運銷外洋；裝篋者係粗茶，轉銷各省。每箱重量約50—60斤，每篋重量約70—80斤。茶行所用之秤，每斤31.6兩，茶莊批發者每斤16兩，門售每斤14.8兩，至1931年均改為市秤。

錢塘江上游茶葉水運到杭州江干閘口後，轉運出口分二路：水路經中河至拱埠，由內河小汽船運至上海；陸路由閘口用火車運至上海，再由上海轉運。1931年，由火車運出者為19.017萬擔，由水路轉運者為15.3902萬擔。

20世紀30年代茶行佣金為7%，向茶商抽取2%，茶戶抽取5%。閩茶運杭州不多，民國時多由海道運滬。杭州茶葉雖有武夷茶銷賣，多由上海轉入，每年不過20—30擔。

抗日戰爭期間，茶葉被視為戰略物資，徽贛茶轉從溫州出口，以貨易貨，換回軍需物資，所以限制沿錢塘江運抵杭州，錢塘江水道茶路遂告斷絕。

三、繁盛的杭州茶葉轉運服務業

晚清民國杭州作為茶葉集散地，與銷售茶葉有關的服務業，如牙行、過塘行及轉運、堆疊、挑埠、報關、保險等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十分興隆。

依照慣例，凡經營行棧、代客買賣營業者，必先請領部帖，分等納稅，然後始能開業。故凡領有此種部頒牙帖之商行，概稱為“牙行”。浙江牙行在晚清時本來僅限於請領部頒牙帖一種，此外如絲繭行由司給發諭單，鈔戶由司給發季鈔執照，二者均不在牙行之列。辛亥革命後，經臨時省議會議決，捐換牙帖簡單，所有以前申領的部帖諭單鈔照者，一概稱為“牙行”。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浙江省政府頒佈《浙江省徵收牙行營業稅章程》，規定凡以代客買賣收取牙佣為業者概稱“牙行”。牙行的成立，以申領牙帖及繳納捐稅為最主要手續。所申領牙帖分兩種，一是年換牙帖，一年一換；二是季換牙帖，一季一換。申領牙帖手續需取具該地殷實商號三家保結，轉請省府財政廳核發。1933年，浙江省僅專司茶葉生意的茶葉牙行就有432家，其中一半以上在杭州。^①

“茶葉過塘行”即專司茶葉運輸的商行。過塘行的營業收入主要靠佣金，佣金之大小隨交易之多寡而定。此外代客墊付上下挑力，亦有回扣可取。因客家人地生疏，大都委託過塘行代辦。但代墊之款，最早約一月以後方可收賬。如是熟客，則大都逢節清賬。過塘行之資本較大者，兼營代客採辦貨物、代付貨款。杭州的過塘行兼有客棧性質，行中設備床位，以便客家寄寓，同時供給伙食，概不取資。無論大小過塘行，一律在市政府登記領貼，不取得牙貼，不准營業。牙貼捐分長期、短期兩種，長期以十年為有效時期，捐額分甲乙丙丁四種，以過塘行之地段營業資本為標準。帖費自200—500元不等。短期有效期為一年，亦分四種，帖費自30—50元不等。杭州過塘行大多設立於江干一帶，這裏前臨錢塘江，後負滬杭鐵道，水陸交通最為便利，自三廊廟

^① 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撰：《中國實業志·浙江省》第四編第九章《茶》，杭州：浙江省國際貿易局，1933年，第158—159頁。並參見陶德臣：《近代浙江茶業述論》，《古今農業》（北京）2000年第1期。

至閘口塘上，連綿十餘里，過塘行林立。

杭州最初的茶葉過塘行，當在五口通商以後。現存史料中可以佐證這一推斷的是一件牙帖。所謂“牙帖”即今營業執照，是店家、商行交納稅金後，官府頒給商家開業之官府憑證。這件牙帖長99厘米，高64厘米，分成兩塊，右側是牙帖，左側是官牙。右側的一塊牙帖寬60厘米，高64厘米，上端梯形黑框中有大字“牙帖”兩字，下面右側是官府的納稅文告。左側一塊為“官牙”，寬39厘米，高64厘米，上面梯形黑框上為“布政使司”四個大字，下面正中有“官牙”兩字。“官牙”除所填文字與牙帖雷同外，末尾還有“給該牙懸掛”字樣。左側有毛筆填寫“錢塘縣封引茶葉過塘”、“閻鵬九”、“肆錢”、“美政橋”等字樣。“牙帖”和“官牙”都蓋有正方形“浙江省布政使司”的關防大印。

這說明該牙帖是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初三由浙江布政使司頒發給杭州府錢塘縣封引茶葉過塘行業主閻鵬九的營業執照。閻鵬九的茶葉過塘行，開在杭州錢塘江邊的美政橋，按規定繳納稅銀四錢獲得牙帖。這家過塘行開辦時間前後長達近一個世紀，直到1946年《杭州市經濟調查》中，仍然記錄有閻鵬九轉運過塘行。另外，現存的1934年杭州方正大茶行賬冊中有“付閻鵬九過力大洋三拾五元，小洋拾壹角”字樣，以及民國時期“杭州閻鵬九轉運過塘行汽車運貨承接處”名片背面“專運茶葉 徽州至杭州”等字樣，以及過塘行行址在杭州江干美政橋等資料，足可認為它是一家轉運茶葉的百年過塘行，堪稱是近代杭州茶葉過塘行的一個縮影。一個側面而言，它也印證了晚清民國時期杭州茶葉集散長盛不衰的歷史事實。

杭州過塘行有徽幫、金幫、開梢幫及糧食幫之分。徽幫係徽州人經營，專以兜攬徽幫生意為主，凡皖南之茶葉、生漆等業務，皆歸徽幫過塘行。金幫以轉運京廣洋貨為主，開梢幫則凡一切雜貨，皆可代為過塘，糧食幫則專營糧食一種。金幫、開梢、糧食三幫多為義烏人所設立，寧紹人僅佔少數。根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載，當時杭州過塘行有118家。據1934年《杭州市社會調查》載，杭州市過塘行同業公會設於江干洋泮橋，有會員107家。《杭州史地叢書》也載，民國杭州有過塘商業同業公會，設於南星橋烏龍廟。另有承接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設於城站毛家井6號。過塘行的興旺，必然需要行業公會來進行行業自治管理。這三家同業公會的出現，足以說明杭州過塘行繁榮昌盛。

除了過塘行外，民國杭州擔負茶葉等商貿物資的轉運業也很興盛。1934年《杭州市社會調查》載，杭州市轉運業同業公會設於羊市街67號，有會員83家。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記載，杭州當時轉運業行號共計112家，大部分行址在錢塘江畔的江干閘口一帶。

堆疊業類似於後世的貨運倉儲業，也是隨着貨物轉運繁盛而發達起來的服務業之一。晚清民國時期杭州堆疊業有碼頭堆疊、海關堆疊、錢業附設之堆疊（浙江興業銀行及杭州儲蓄銀行在杭州湖墅所設之米棧，既堆存貨品，又做押款，保管擔保品）、行家所附設堆疊、鐵路堆疊、保管堆疊之分。從杭州堆疊業種類之多、分工之細，可知堆疊業之發達，業務之興盛。

挑埠業實際上是裝卸貨物的人力挑夫搬運業務，多設於碼頭等貨物往來繁盛之處。民國杭州城區挑埠行，多設在城區、江干閘口、湖墅拱宸橋各地，計有65家，其中集於江干閘口兩地最多，約30家。這些挑埠行號皆需領照，方可開設。大者挑工六十餘人，小者挑工七八人。當時江干閘口一帶為上溯錢江及轉赴寧紹等處轉運要道，搬挑業務繁忙，挑埠行較多而集中。湖墅拱埠雖亦為運輸大埠，然不及江干閘口之繁盛，挑埠家數較少。城區內挑埠，則多散佈於接近船埠

的臨河街市，每一埠頭至多不過一家。該業內部組織極為簡單，但對挑工入埠限制頗嚴，沒有相當保證不能入埠。貨物繁多之埠，各埠都有約定俗成的指定地段，甲地挑埠不能越界搬挑乙地之貨。如沒有這項規約的地方，則任由貨客自行指雇，不限地段。城區挑埠計13處，江干閘口挑埠共29家。

報關行業務主要是代客商辦理報關手續，但也有代客商裝卸貨物，或介紹船隻，或設置房間以便客商住宿，或經營臨時棧房以便客商堆貨，或代客寄遞郵件、包裹辦理郵寄手續的。報關行營業，一靠佣金，佣金平均每件常在四分左右，二靠墊款利息，三靠報關行代商人評估稅項，可有折扣，如商家輪船水腳，報關行多有一四扣。此外，如專代客商郵寄貨物的報關行，則除郵票、關稅外，報關行每包常收取手續費若干，手續費自一角二分至二角不等。杭州曾有13家報關行代理杭茶、浙茶、徽茶、贛茶的轉運出口業務，資本總額為26,800元，平均資本額2,061元。

近代保險業發源於上海，早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即成立保險業同業公會。保險業實為銀行之一種，因交通運輸發達，運輸貨物的險種也隨之產生。浙江保險業源自杭州，多為設於上海總公司的杭州分公司或代理處，1919年為杭州市保險業發達時期。1933年杭州的保險業有34家，其中中國9家，其他均為美、德等國所開設，險種多為水火保險，也含運輸途中、堆疊之水火保險。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載，杭州市保險業增至58家。茶葉外運途中最怕受潮，故而茶行托運茶葉需要辦理水險。民國十七年（1928）杭州吳怡和茶莊運洋茶就投保太古公司水險。^①

餘論

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商業集市的世界博覽會，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展示近代工業文明成果的盛會。在1851年英國倫敦舉辦的第一屆世博會上，就有中國絲綢和茶葉參展的身影。其中有一段關於“貢茶”的評語，被認為就是西湖龍井茶。其文曰：“就口感而言，沒有比一種叫‘貢茶’（或譯官僚茶）的更好了。這種茶僅經過短時的烘焙，在最佳（保存）條件下仍易受潮，因此經不起運輸和保存。在中國的富有人家，這種茶需求量很大，在當地市場上賣到20先令一包。”當年參加倫敦首屆世博會並獲得金銀牌各一枚的徐榮村在“得獎感言”中說，浙江“一絲一茶，必居上品”。其後，在1873年的維也納世博會、1876年的費城世博會、1900年的巴黎世博會、1905年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1926年的費城世博會上，龍井茶頻頻獲獎，名揚天下。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世博會上，上海茶瓷公司參展的各種上等茶葉獲得各色超等文憑、金牌，其中西湖龍井茶，引起美商白蘭克（Blank）公司（為晚清中國茶瓷美國總代理商）的極大興趣。該公司不僅全部收購上海茶瓷公司在展會零售剩餘的茶葉，還當場與其訂立銷茶合同，白蘭克公司後來成為上海茶瓷公司在美國的總代理，促進了包括西湖龍井茶在內的中國名茶的生產和銷售。^②中國茶在各類世界博覽會上的頻頻獲獎，為中國產品贏得了良好的聲譽。這其中，杭州的西湖龍井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西湖龍井成為了中國高級綠茶的代名詞。

[責任編輯 劉蘭英]

① 鮑志成編著：《杭州茶文化發展史》上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418—427頁。

② 趙大川編著：《龍井茶圖考》，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第114頁。